政大史粹第十二期
2007年6月，頁81-109

《儀若日記》所見日俄戰爭之中國中立問題*

彭思齊**

摘　要

過去學界對日俄戰爭期間中國之「局外中立」政策研究，因受革命史觀、民族情感及史料所限制，多持負面評價，著重於清廷決策失當，而忽略中國在戰爭中執行中立國角色的重要性。近年出土之《儀若日記》，主人翁鄒嘉來長期任職於清政府外交機構，日俄戰爭期間，承擔處理對日、俄交涉之重任，並因傑出表現為日後發展奠下基礎。其日記中，記載許多日、俄如何挑戰中國中立地位，外務部如何堅守法理立場，委婉應付各方壓力的案例，實可彌補過去學界依賴官方文書之不足。本文由史料分析出發，並依據此新史料，重新考察日俄戰爭期間之中國中立地位，希冀能於其中，進一步瞭解局外中立期間清廷所面臨的困境，及其努力過程，以給

* 本文初稿〈由日俄戰爭中國局外中立看《儀若日記》史料價值〉，發表於中國近代史學會「函電與日記中的近代歷史」研討會，經大會同意修改外投。特此感謝研討會中前輩學者之批評與指教，修改期間唐啟華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的修正意見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予中國中立更公允的評價。

關鍵詞：《儀若日記》、鄒嘉來、日俄戰爭、中國局外中立

一、 前言

清末外務部尚書鄒嘉來之《儀若日記》經輾轉流離，影本現藏於日本「東洋文庫」。存本始自光緒十三年七月(1887 年 8 月)，終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 年 1 月)，其中因戰亂殘缺之處，「所載固略而不詳，然當時交遊往還，亦可概見一二。[1]」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後的爲例，不僅紀錄鄒嘉來在清末外務部的發跡過程，亦紀錄晚清外交的實際運作狀況。內容頗多可作爲清末外交史的補充史料。

鄒嘉來素有「外務部活字典」的稱號[2]，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由底層一路當到主政者，經理過諸多外交大事，其中日俄戰爭期間參與之交涉，更爲其宦途重要轉捩點[3]。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和地位，鮮少有研究者持正面肯定態度。特別是局外中立政策問題，研究者常認定其種下日後東北亂局的禍根。

本文試圖透過分析《儀若日記》，進一步瞭解中國局外中立的實際狀

---

[1] 潘景鄭，〈日記來由注記〉，收入：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十三年卷(未刊本，現藏日本「東洋文庫」)。

[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1980)，頁39。

[3] 鄒應蕙，〈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紫禁城內騎馬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弼德院副院長顯考紫東府君行述〉，收入：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卷。

況。首先簡介中國在日俄戰爭中的中立地位，繼而分析過去相關研究中的史料運用狀況，最後以《儀若日記》爲中心，重新觀察中國如何努力扮演中立國角色，特別是過去鮮少討論到的外務部角色與作用。

二、 中國局外中立政策概觀

庚子拳亂後，俄國於中國東北的行動，引起在華列強關注，其中尤以積極發展朝鮮的日本最爲敏感。1902 年 1 月 30 日英日締結同盟，迫使俄國在與法國發表聯合宣言，聲稱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之餘，於 3 月 26 日與清廷簽訂〈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同意分三期逐步退兵東北[4]。但不久局勢又起變化，1903 年 4 月開始，俄國陸續提出與開放東北政策針鋒相對的要求，企圖納東北爲其殖民地。此一背約行動，激起中國、日本與國際極大地反彈[5]。中國官方爲保全東北，避免它國責難，乃力駁俄國所開七條損害主權之要求，堅持俄國履行撤兵約定[6]。國際間除美國警告中國，勿讓俄國得寸進尺外[7]，日本亦與英美密商解決辦法，籲請清廷切勿接受俄

---

[4] 坂野正高著，陳鵬仁、劉崇稜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台北：臺灣商務，2005)，頁394；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頁135-138、147-148。

[5]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頁159-162；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448-452。

[6]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7]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六日。

國所開條件[8]。雖然俄國無視各國抗議，仍於 9 月提出新協定，但清廷並未與之妥協。

俄國持續地佔領政策，撼動了東北亞局勢。日本遂於是年 7 月主動向俄國提出談判。兩國一面談判，一面進行軍事佈署。中國則在一致譴責俄國同時，出現兩派不同意見，一派主張聯日抗俄，張之洞、盛宣懷等人皆提出類似建議；另一派以北洋袁世凱為首，認為衝突若爆發，應立即選擇堅守中立[9]。日俄談判最終因俄國的強硬態度而陷入僵局，日本遂終止對談，於 1904 年 2 月 5 日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2 月 8 日襲擊停泊旅順俄艦，戰爭就此開啓[10]。

開戰後為避免捲入戰爭，清廷於 2 月 12 日頒布「日俄戰爭中國嚴守局外中立條規」，宣布局外中立。內容首先聲明特別事宜，目的在使各國尊重中國之中立；繼而針對中國官民應遵守之義務，及應享之權利加以條列規範；最後限制戰爭國軍隊在局外地區的行動[11]。中立政策在當時雖得到各國支持[12]，卻在日後受到盲目地批評[13]。但無論如何，中國中立為一

---

8 〈(四八七八)駐日本大臣蔡鈞致外務部電〉，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67(台北：文海，1963)，頁1280；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154。

9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87.2(濟南，2005)，頁121。

10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頁171-172。

11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台北：文海，1963)，卷181，頁36-38。

12 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455-456。

13 喻大華針對過去的批評進行討論，其認為長期以來均未予深究，僅簡單否

既成事實，且直迄戰爭結束，清政府未曾放棄過此政策。

清廷主政者對國際法上「戰時中立」的原則並不陌生，在 1884 年中法戰爭前曾有過一番討論[14]，1864 年由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一書，亦收有相關內容。但當時國際上對中立問題尚處於摸索階段，1899 年海牙保和會所議定之戰爭公約中[15]，僅在〈約後陸地戰例章程〉中對「在局外國境內拘留敵兵、醫養傷兵」專章規定[16]。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雖大量翻譯國際法書籍，戰前並積極蒐集有關中立之法規[17]，甚且於 1904 年戰爭爆發後有吳振麟《局外中立國法則》一書出版[18]。但此次戰局有別於前，

定。見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87.2，頁118。

[1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80)，頁242-243。

[15] 1899年海牙保和會，主要討論限制軍備與國際仲裁等問題，結果僅在和平處理國際糾紛及戰爭文明化上達成部分協議，總計除會章外，共議定「和解公斷條約」、「陸地戰例條約」及「推廣一八六四年日來弗原議行之於水戰條約」三公約，及三項禁用猛力軍火聲明文件。見唐啟華，，〈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3(台北，2005)，頁48；郭子雄、薛典曾編，《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台北：臺灣商務，1971)，頁1-28。

[16] 主要在確立1864年「日內瓦公約」之內容。郭子雄、薛典曾編，《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頁19。

[17] 如盛宣懷曾提及，政府在支持中立意見時，曾「另伍(伍廷芳，筆者註)查西例有無似此成案」。見〈楊道文駿來電〉，收入：盛宣懷撰，《愚齋存稿》下冊，卷62(台北：文海，1975)，頁1370。

[18] 吳振麟於東京收集大量國際法新知，著成此書。吳振麟在「序言」中指出：「我國言公法之書，自昔同文館譯本，恐已陳腐不可引用。而近年新出一二種，大抵言昇平時之國際公法，而未及戰亂時之國際公法，更何論局外中立國之法則呼。」可見得當時中立法參考書籍之缺乏。見吳振麟，〈局外中立國法則序〉，收入吳振麟，《局外中立國法則》上編(東京：戰時

中國並非交戰國，且又劃已地爲戰區，這樣的情況在國際武裝衝突中並不常見，因此仍存在許多問題。

根據《萬國公法》之規定，戰時局外之國不可厚此薄彼，交戰國亦不可強迫中立國分擔戰事[19]。清廷雖然依循著此原則訂定條例，分別針對本國人民的權利、義務進行規範，也對交戰國加以約束，並以「特別事宜」限制在中國的列強，但條例內容在戰爭前後仍引起極大的討論[20]。清末服務於海關的馬士(H. B. 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收錄〈關於日俄戰爭時期中國中立問題的備忘錄摘要〉一文。此備忘錄是爲提交 1907 年海牙保和會所擬，內容指出中國此次中立問題牽扯複雜，因此若輕易認定「它似乎對於幾乎為近代中立國家所必須履行的那些義務連一種初步的觀念都沒有」，可能有失偏頗[21]。備忘錄進一步分析中國所牽涉到的十一項問題，包括：

(1)在滿洲的戰爭行動。

(2)在戰區以外的破壞中立問題。

(3)船舶的拘留問題。

(4)被拘留人員的管轄問題。

國際法調查局，1904)，頁2。

19 惠頓(Henry Wheaton)著，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譯，何勤華主編，《萬國公法》，頁221-222。

20 在1907年海牙保和會討論戰時中立問題時，一度成為爭辯焦點。見鄭雪飛，《“自由船、自由貨”：戰時中立國海上貿易權利之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1-12。

21 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518。

(5)“滿洲人號”和“亞斯柯德號”兩船案。

(6)驅逐艦“剛毅號”事件。

(7)驅逐艦“拉斯特羅尼號”事件。

(8)拘留在芝罘的驅逐艦問題。

(9)波羅的海艦隊的避難船只問題。

(10)違禁品貿易問題。

(11)日本對中立責任的干涉[22]。

撰寫備忘錄的戴樂爾(Francis Edward Taylor)海軍大佐，在確實考察中國執行狀況後認爲，若能觀察出中國急切於做出正確行動，則那些被指責的疏失，其實也不足爲奇[23]。

從這篇備忘錄出發，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一爲中國對中立決策的貫徹與執行，另一爲國際對中國此次中立的評價，以及它在國際法案例中的價值。但因當時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弱勢地位，使這些問題向來很少被注意。除此之外，日俄兩交戰國對於中國中立態度反復無常，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以日本來說，口頭上是中國中立的支持者，但不尊重與破壞中立條規，實不下於俄國；相對地，戰爭中不斷失利的俄國，一開始即對中立規範有許多意見，但最後反成爲要求中國嚴守中立最力的一方。這些複雜的問題，皆有待進一步研究。

[22] 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519。

[23] 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518-519。

三、 中國中立之史料與研究回顧

清廷的中立政策對日俄戰局影響深遠，在執行過程中，清廷雖因對國際法瞭解有限，而屢遭日俄及國際質疑[24]，但也是戰爭不致擴大的關鍵。過去日俄戰爭研究中，有關中國局外中立狀況的介紹，相較於戰爭起因和經過，以及樸茨茅斯條約簽訂等議題，受到關注的程度相當有限。探究原因，除了兩岸學界長期受革命史觀影響，致使研究集中於中國主權受侵犯，視清廷決策爲腐敗懦弱的表現等層面外，史料運用的侷限，亦不可忽略。

探討此一重大國際事件，首先當由官方檔案著手。在既有研究中，清末民初王彥威、王亮父子所編之《清末外交史料》一書，爲主要參考史料。此書出版於 1932 年，收錄光緒、宣統二朝重要對外交涉，包括「海防、邊防之策，主和主戰之謀，傳教規章、通商條約、租借會審之例……。[25]」內容相當豐富，舉凡局外中立條例、日俄海戰情報、中國嚴守中立之努力、日俄破壞中立以及抗議照會等皆可見[26]。研究者大多藉此描繪中國中立之輪廓。其次，北平故宮博物院利用軍機處檔案爲基礎出版的《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收錄大量地方大員及出使大臣奏摺，日俄戰爭期間來自各方的上奏意見，爲觀察清末官員對局外中立反應的最佳史料。該書於卷 75 至 87 特將東省日俄戰事相關收發電稿，整理爲「東事收電檔」與「東事發

---

24 任天豪，〈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頁52-58。

25 王彥威、王亮編，〈清光緒朝外交史料跋〉，《清季外交史料(六)》，頁553。

26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卷179至191，頁1-175。

電檔」[27]。另外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宮中奏摺、起居注、實錄等等皆已整理出版，這些都是過去研究中必備的基本史料。

在大陸地區，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持續進行的清代史料整理，近年來使用者逐漸增加，有助於提升學術水平。其中相關文件，如出使日本大臣楊樞與湖廣總督端方的往來信函，已在《歷史檔案》中刊印介紹[28]。另外東北遼寧省檔案館在 1995 年編輯《日俄戰爭檔案史料》一書，亦經常被引用。此書在〈選編主旨〉中雖透露不滿中國中立之政策，但書中〈清政府“中立”〉部分，仍提供許多地方交涉局的實際反應和遭遇的問題[29]。其餘收錄資料則多爲東北人民被壓迫的殘酷面，以及奮勇抵抗的事蹟，常爲強調民族情感立場的研究者所使用[30]。2004 年紀念日俄戰爭百年同時，東北財經大學出版《日俄戰爭在大連叢書》三冊，其中《日俄戰爭史料集》是編者群遍尋北京國家圖書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以及東北、日本各大圖書館所藏史料後翻譯編輯而成。內容主要收錄與大連地區相關的文獻資料，出版後成爲研究日俄戰爭的重要史料集[31]。在台灣方面，近年

---

27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75至87，頁1419-1676。

28 王澈，〈日俄戰爭期間楊樞致端方函〉，《歷史檔案》，1(北京，1996)，頁66-75。

29 遼寧省檔案館編，《日俄戰爭檔案史料》(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頁81-212。

30 可見於幾篇討論日俄戰時民族主義的文章。如關捷，〈日俄戰爭與中國——寫在甲辰日俄戰爭百年之際〉，《大連民族學院學報》，6.6(大連，2004)，頁38-43；李安山，〈中國民族主義的催生與困惑——從《東方雜誌》看日俄戰爭的影響〉，《國際政治研究》，1(北京，2006)，頁96-111。

31 關捷，〈《日俄戰爭史料集》序言〉，收入：關捷、董志正、田久川主編，

來漸有學者利用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藏外交史料進行研究，其中外務部的朝鮮檔、保和會檔、駐外使領檔皆有助於探討此一議題[32]。

除了官方檔案外，研究者通常還會引用報刊雜誌。庚子事變後，社會興起一波出版熱潮，報刊雜誌大量出現，這些刊物存在時間往往不長，但對知識以及新聞的流通卻有很大的幫助。中立問題研究上，最常引用的刊物莫過於《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以及《東方雜誌》，三刊物皆發刊於 1904 年左右，其中以 1903 年 12 月革命派創刊的《俄事警聞》最為人注意。此刊物以「反俄」為基本立場[33]，旨在喚醒各階層共同抵制俄國、注意東北利權[34]。《警鐘日報》是由《俄事警聞》改版發行[35]，延續《俄事警聞》之精神，作為「警鐘」以喚醒國人的向心力，反俄親日言論充斥其

《日俄戰爭史料集》(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宋玉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俄戰爭在大連叢書》評介〉，《東北財經大學學報》，42.6(大連，2005))，頁95。

32 如川島真〈日露戦争と中国の中立問題〉一文即使用保和會檔；任天豪於其〈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碩士論文中討論中立期間紅十字會問題時，亦參考保和會中關於籌辦紅十字會之檔案；另外崔志海於〈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也利用已出版之《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來討論中立問題。見川島真，〈日露戦争と中国の中立問題〉，收入：軍事史学会編，《日露戦争(一)国際的文脈》(東京：錦正社，2004)，頁79-96；任天豪，〈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頁51-58；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上海，2005)，頁66-75。

33 《俄事警聞》1903年12月15日第1號(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2。

34 彭法，〈日俄戰爭前夕國人心態剖析—以《俄警事聞》文章為據〉，《貴州社會科學》，201.3(貴陽，2006)，頁157。

35 《俄事警聞》1904年2月25日第73號，頁455。

間。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雜誌》，除了轉錄國外新聞外，亦有代表當時部分知識份子觀點的社論，特別在「日俄戰事紀要」系列文章中，對中國中立所面臨之問題及情況多有著墨[36]。其餘如《申報》、《中外日報》等民間刊物，皆是站在非官方立場觀察時局，較清楚地呈現社會反應。以此類史料爲中心的研究，目前已稍有成果[37]。

另外尚有一類史料較少爲研究者使用，卻有一定重要性，即時人的日記、回憶、文集和函電等私人文獻。此類史料，往往因所存有限，蒐集不易，且常隨當時人所處環境而有不同價值，所以即使時代相符，也不一定對研究者有幫助。過去研究中，朝臣大員之文集、日記、回憶錄和函電稿等較爲人所重視，特別如南北洋大臣、各地區總督等洋務派大將，如天津市圖書館與天津社科院歷史所合編的《袁世凱奏議》即爲典型代表[38]。其餘像立憲派、革命派要角之資料亦爲人所重視，如《梁啓超全集》收錄的〈日俄戰役關於國際法上中國地位及各種問題〉[39]，即可視爲在野知識份子

---

36 《東方雜誌》，光緒三十年第1卷第1期至第12期、光緒三十一年第2卷第1至12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3)。

37 彭法的〈日俄戰爭前夕國人心態剖析—以《俄警事聞》文章為據〉，是以《俄警事聞》為中心；李安山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催生與困惑——從《東方雜誌》看日俄戰爭的影響〉，是透過《東方雜誌》來觀察。見彭法，〈日俄戰爭前夕國人心態剖析—以《俄警事聞》文章為據〉，《貴州社會科學》，201.3，頁157-159；李安山，〈中國民族主義的催生與困惑——從《東方雜誌》看日俄戰爭的影響〉，《國際政治研究》，1，頁96-111。

38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臺北：台灣商務，1993)，頁115-117。

39 梁啟超，〈日俄戰役關餘國際法上中國地位及各種問題〉，收入：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237-1241。

的觀點。

在中國局外中立的討論中，盛宣懷的《愚齋存稿》最常被引用。時爲工部左侍郎的盛宣懷，於 1903 年參與對日商約談判，甲辰日俄戰爭爆發後更負起籌設紅十字會的要任，且於 1904 年年底奉派查辦上海俄兵誤殺華民周生有命案，對中國局外中立時期外交頗有貢獻[40]。其遺集中與局外中立問題相關者，主要爲私人往來函電，內容有別於上呈奏稿，官員私底下意見之交換，正可反應朝中不同的聲音。然而相對於朝中大臣的私人文獻，在野知識分子或反動派反而較少受到注目，且相關史料多散藏於地方檔案館中，不易取得。此外，這些私人史料記述立場的差異，以及事件參與程度的不同，亦是研究者採擇時的重要考量。

以上官方檔案、報刊雜誌及個人文牘三類史料，是目前日俄戰爭中國局外中立研究最常使用的材料，三者在相互對照與補充後，共同建構起這段歷史。但在既有研究中，第三類私人史料卻相對欠缺。詳記 1904 年到 1905 年重要外交交涉的《儀若日記》，正可彌補此一缺憾。

鄒嘉來於光緒十六年(1890 年)考取總理衙門章京，自此展開二十餘年的外交職業生涯，期間不僅親歷晚清外交機構轉型，亦參與多項對外交涉，至晚年升任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41]。《儀若日記》泰半篇幅，即爲此重要二十年大小事的記載[42]。鄒嘉來初入總理衙門時主「收掌之務」[43]，

---

40 盛毓常，〈誥受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顯考杏蓀府君行述〉，收入：盛宣懷撰，《愚齋存稿》上冊(台北：文海，1975)，頁28。

41 鄒應蕙，〈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紫禁城內騎馬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弼德院副院長顯考紫東府君行述〉，收入：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卷。

42 東洋文庫現存《儀若日記》始自光緒十三年，終於光緒三十三年，其中有

因草擬之公牘頗得賞識，隨著官位提升，漸成爲總署內重要的擬稿人員。光緒二十七年底瞿鴻禨任外務部尚書，頗倚重其專長。光緒二十九年三、四月間，與俄國交涉東北問題的關鍵談判，鄒嘉來即參與其中。[44]同年七月曾短暫借調商部，但仍兼顧外務部之事務，十月始辭去商部職務。此時正值日俄交惡之際。十二月日俄開戰後，中國宣告中立，鄒嘉來因得各堂之信任，得以一展長才。其子鄒應蕙在所撰〈行述〉有言：

> 十二月日俄戰事起，中國守中立，處積弱之勢，以筆與兩強國抗，一切文電各堂悉委府君任之，府君竭誠贊畫，悉協機宜。……計府君在部稍得發抒者，在此數年；而能驟致通顯，亦在此數年[45]。

鄒嘉來雖非檯面上的談判人物，卻也站在中立交涉最前線，其傑出表現，爲日後在部中之地位奠下基礎。綜觀鄒嘉來之官宦生涯，這兩年之表現若與日後任外務部尚書時的評價相比[46]，實可謂爲最高峰。

日俄戰爭期間，鄒嘉來對擬辦過之事務皆簡要筆記於日記中，諸如與

因戰亂等原因而事後補記於其他年度者，也有部分可能是缺記，或遺失者。光緒十六年後共十二年有日記，但僅十六至十八年為完整，二十年及二十二到二十七年或缺或遺。

43 係指收發電報的工作。鄒嘉來初入總理衙門，在俄股擔任收掌事務。見鄒應蕙，〈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紫禁城內騎馬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弼德院副院長顯考紫東府君行述〉，收入：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卷。

44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三月至四月。

45 鄒應蕙，〈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紫禁城內騎馬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弼德院副院長顯考紫東府君行述〉，收入：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卷。

46 當時對鄒嘉來任外務部尚書的評價為「只能挑剔公事，遇有重大交涉一無主張」。見蔡振豐，〈晚清外務部之研究〉(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137。

上下官員的往來溝通，情報消息的獲取，以及危機事件的處理過程等等，雖無深入的評論，卻可看出官員面對中立交涉時心態的轉變。除此之外，日記中亦同時記載如西藏、庚款等問題之交涉，突顯出外交事務間微妙地連動。這些內容，無論對期間大小事件的瞭解，抑或交涉細節的耙梳，皆能給予印證與補充。特別是日記中幾次描寫參與關鍵性交涉，更是過去史料所未見。只可惜現存日記，僅見光緒三十年五月至三十一年十月部分，三十年初之記載未能存留，但應無損此份史料的價值。因此，下文筆者即以《儀若日記》爲中心，來觀察清廷在日俄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四、 由日記看中國局外中立

在國際武裝衝突規範尚未完全確立的年代[47]，日俄戰爭中清廷之中立政策雖存在著缺陷，但清廷仍盡力堅守立場，不援助任何一方[48]。執行中立過程中，交戰兩國所施加的壓力，以及列強的關注和態度，都促使清廷在決策時須謹慎考慮每一環節。開戰後，日俄相繼對中立政策進行挑戰，包括軍隊擅入局外之地、戰爭國於戰區招匪、逃難船處置，以及貨物運送的限制等爭議問題。這些爭議時而針對交戰對手，時而抗議中國官方，在不完善的條規底下，交戰國爲求得勝利，不擇手段地破壞中立，讓中國疲

[47] 戰時中立等戰爭法規問題，於1907年在海牙舉行第二次保和會有所討論決議。見唐啟華，〈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3，頁63。

[48]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87.2，頁122。

於奔命。究竟中國的表現如何？我們即以《儀若日記》爲基礎，來檢視清廷實際的應變與努力。

清廷首先遭遇之問題，是進犯局外領土交涉。戰爭爆發後清廷「劃地爲戰」的決定，使自身陷於兩難之境。俄國對蒙古、東北鐵路及遼西歸屬中立頗多意見，爲避免戰局擴大，及防止俄國回到已退兵之地，於是清廷採取不妥協地堅定立場[49]。直迄戰爭結束，日俄雙方不斷突破戰界，並相互指責對方破壞中立，中國亦被牽扯其中。此類爭議中，光緒三十一年一月(1905 年 3 月)所發生俄國抗議日本繞道蒙古之事最爲國際關注。在這次事件，俄國先發制人，以官報發佈通告，向各國控訴日本違反中立[50]。外務部得知消息後，立即致電北洋、盛京要求徹查。俄國所發通告中，有「內有並照直督派兵相助語」的字眼，暗指中國與日本勾結[51]。次日外務部隨即要求駐俄公使胡惟德，與俄國討論其在遼西進犯中立的問題[52]，以此與之相辯。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1905 年 3 月 4 日)駐日公使楊樞電告，日本以「俄不犯中立，日本必不先犯」作爲繞道蒙古之藉口。俄國爲避免與中國爭論遼西問題，遂表示「通告係指日本，不指中國」[53]。此事最後以

---

[49]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卷182，頁44-45。

[50]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83，頁1581。

[51]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52]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53] 關於俄國通告不指中國一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較《清季外交史料》晚一日，查鄒嘉來日記時間為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3月4日)，與《清季外交史料》時間同，故於此先採此時間。見《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卷187，頁113；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

日本自遼西撤軍收尾，但戰爭期間清廷所限定之戰區，屢爲交戰兩國所突破，尤以遼西受擾最爲嚴重。面對類似問題，清廷是否能妥善應付，往往成爲抑制戰局擴大的關鍵。

清廷接著面對的另一困擾爲招匪問題。戰爭中，交戰國兩國皆在戰區招攬匪徒，以之爲運輸或作戰用。但交戰二國同時又指責對方招匪，並認爲清廷管束不力。類似爭議關係到對本國人民禁令執行是否確實，爲避免落人口實，清廷亦須小心應對。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 年 7 月 4 日)盛京將軍增祺奏報日俄雙方於遼西招匪，指稱雙方皆有違反中立事實，但因阻止不力反受交戰國責難，使增祺深深體悟中立國之窘境[54]。五月二十五日(1904 年 7 月 8 日)俄使親至外務部，與左侍郎聯芳商談日本在遼西招匪問題，並表示對清廷的疑慮[55]。清廷回應，除宣稱地方官對招匪事未有知悉外，也轉達日本不承認招匪之態度。中國未能阻止日軍招匪一事，讓俄國一度質疑清廷是否確實嚴守中立，最後導致俄國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九日(1905 年 1 月 14 日)宣告中國未能恪守中立的控訴中，再三強調中國放縱日本於東北招匪[56]。當時中國以「中國兵力所不及」、「招匪爲兵創自俄軍」、及「中國官民乃私往助戰」，並不違反中立爲由駁斥了俄

冊，卷83，頁1583。

54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77，頁1488。

55 「俄使與聯堂言，日本在遼西招匪事，疑我務，多當面駁之」。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56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十一日；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82，頁1560-1561。

國的控訴[57]。經此次交涉，中國更加謹慎處理招匪事宜。光緒三十一年一月(1905 年 2 月)俄使再次來照，稱日人與胡匪同出入，外務部獲知後雖有較積極的行動，立即詰問日本，並行知盛京理藩院查禁[58]。但直迄戰爭結束，清廷主要都以「中國官方兵力未及」來應付雙方指控[59]。

面對上述問題，中國尚可以警告禁止，或藉口管轄不及來處理。一旦遇到危急局外通商口岸安全時，所面臨的情況即更爲複雜。如前引備忘錄所歸納，此類交涉主要爲交戰國戰船停泊中立港口問題，特別是俄國逃難船交涉。在《儀若日記》中我們也發現，這些交涉較爲棘手，且往往拖延日久。開戰不到一個月，上海即發生俄兵輪滿洲號停泊不離之爭議[60]。此事件最後在滬道袁樹勛參照中立規章，與俄、日雙方交涉後，於光緒三十年二月十四日(1904 年 3 月 30 日)順利解決。俄國同意滿洲號拆除軍械及輪機，僅留二、三十人看守，其餘船員遣送回國；日本軍艦隨後亦駛離[61]。這次滿洲號事件圓滿落幕，避免了一場外交爭端，也爲日後戰爭國逃難船躲避至局外港口提供一參考案例。

光緒三十年七月初(1904 年 8 月中)俄國海戰連連失利，多艘雷艇、兵艦逃至煙臺、上海等地，引發了一連串的紛爭。首先在七月一日(1904 年

---

57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82，頁1563。

58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二十日。

59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七日。

60 《儀若日記》缺漏此事件之記載，關於「滿洲號」交涉的研究，可見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一文，於此不再詳細討論。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頁66-67。

61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頁66-67。

8 月 11 日)，俄國由旅順逃出之雷艇累西迭盧訥號躲至煙臺，允諾遵守中立規則。但日艇於 3 日進入煙臺海域，不顧中國護船之阻止，槍擊俄弁兵，並強行將受損雷艇拖逸而去[62]。日本違反中立的舉動不僅使中國顏面大失，亦引起各國反感。鄒嘉來七月四日日記即記載：「烟台俄艇事，日違中立，各國均不以為然」[63]。次日美國派翻譯官至外務部關切，盼此事能有轉圜餘地[64]，以免中立淪爲具文。外務部爲避免俄國藉口責難，除解釋當時不得已之情況外，並電斥北洋將防禦不力的統將薩鎮冰奏請參辦[65]。同一時間，數艘俄兵艦、雷艇逃至青島和上海。滯留青島之兵輪及雷艇均遵守中立條例，一艘於 24 小時內出洋，另有二艘主動拆卸機具交予中立國保護[66]，除受傷船員上岸送醫治療外，德國亦同意暫囚俄水手於青島[67]。青島未引起紛爭，似乎與日本不想引起德國反彈有關。但與此相對的，是棘手的上海難船交涉。

---

6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九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5909-5912；此與《警鐘日報》所載稍有出入，據報〈俄艦被拘之由〉所述，乃俄人於談判卸除軍裝會議先行襲擊日人，於是將該艦拘捕，不料下午火藥房炸裂，俄人遂跳船，日人有一通事一水手受傷。但該報導資料來源不明，於此僅供參考。〈俄艦被拘之由〉，《警鐘日報》甲辰年七月四日，第4板。

63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四日。

64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四日。

65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五日。

66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八日。

67 〈記青島俄艦卸除軍裝事〉，《申報》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七日；〈詳述俄艦敗逃情狀〉，《申報》光緒三十年七月十八日；〈幽囚水手〉，《申報》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煙臺事件發生後，日俄雙方在上海互不退讓，日本甚至要脅自行採取解決手段，後果由中國負責。但第一線交涉員袁樹勛，及外務部皆堅持中立原則。外務部屢次派聯芳往商俄使，另外亦派翻譯官陶杏南至日使處商談，要求日、俄雙方僅能在「德青島案」和「滿洲船案」間擇一而行[68]。幾經交涉，外務部最後由美使口中得到來自法使的間接消息，指出俄國同意拆卸軍械[69]，並於船體修復後拖至碼頭停泊拆卸機輪，而日本另外要求俄船弁兵一律上岸由中國管束。此一決定使滬道頗感困擾，但也只能與俄方進一步商談約法並加強巡察，以免生事[70]。由煙臺、青島到上海的交涉，外務部及地方交涉員皆盡力依中立條例來約束交戰國，但交戰國似乎抓住中國不願節外生枝的心理，不斷挑戰中國立場，造成清廷之困擾。也因此鄒嘉來感嘆道曰：「今中國為疑，勢弱則交侮良多，因應殊為棘手」[71]，此一觀感與民間輿論不謀而合[72]。然而這只是中立過程中的一波小高潮，交涉日後所衍生之問題，才真正讓清廷疲於奔命。

自從上海交涉結束後，每遇俄國艦艇逃至中國局外港口，即將俄國船主、弁兵運至上海管束，造成滬道極大困擾。除日本要求加強管束，滬道

---

68 「德青島案」係指三十年七月逃至青島之難船處理事件；「滿洲船案」指光緒三十年二月停泊上海之滿洲船事件。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30年七月八日。

69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十四日。

70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頁67-70。

71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七月八日。

72 「嗚呼！我中國以積弱之故，見輕於人，措置不合於法也，故不免交涉之棘手；措置之合於法，亦難免交涉之棘手。」〈論中國處置俄逃艦之難〉，《申報》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三日。

爲免生事也與俄領事約法四章[73]。其中限定俄國兵員不得任意進入租界區，但俄國兵員依然數次潛行逃脫，以致發生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九日(1904年12月15日)俄兵擊斃華人周生有一案[74]。在中、俄雙方爲周案審判權爭執不下之時，俄國於十二月九日(1905年1月14日)向各國通告中國未恪守中立[75]。概此時俄國兵敗連連，周生有案又激起中國人民反俄情緒，俄國頗有利用這接二連三之爭議，打亂中國堅定的立場。也因此，掀起中國堅守局外中立過程中最大的危機。

俄國通告一發出，清廷隨即淡化周生有案，外務部特派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協同滬道袁樹勛辦理此案，很快在十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3日)議定結案[76]。在俄方通告方面，主要指責中國暗助日本，私下與日本通好，內容如鄒嘉來在十二月九日日記所載：

> 胡使來電，俄國通告各國，中國不守中立數款，係日軍僱華兵、華營用日弁、廟島泊日艦等事[77]。

同時美國方面亦來照會，稱：

> 有他國政府行知美政府，中國不守中立，一東北日招匪，一練軍用日本教習，一廟島泊日船，一烟台運禁貨往大連灣，一漢陽鐵廠售與日本生鐵[78]。

---

[73]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頁70。
[74]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頁70-72。
[75]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76]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頁72。
[77]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78]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俄國的這些指責，除生鐵一案早有照會處理外，其餘外務部皆立即要求北洋重新徹查[79]。

來自各方的壓力，迫使外務部必須在最短時間內予以回應，鄒嘉來因職務關係而參與整個過程。十二月十三日鄒嘉來奉命與左參議汪大燮共擬駁復照會，後交北洋、外務部各大臣酌議。三日後向美國回覆照會，並致各駐外使節[80]。照會針對上述指責一一反駁。關於日本東北招匪事，如前所述，以「中國兵力所不及、俄軍先有招匪爲兵之例、中國官民私自助戰中國不擔其責」來駁斥；練軍用日本教習，則稱所僱翻譯於戰前已定，且具結不預戰事，此與各海關聘用俄人之例一般，公法並無禁止；廟島泊日船一事，聲稱經加派稽查並無發現，且未曾准日方借用；煙臺運貨事，聲明無一船運往該灣，且並無海關發給准單之事；至於漢陽鐵廠部分，指稱所售系爲生鐵，並不在禁例之內。此外又舉出俄國屢犯中立事例，凸顯出中國嚴守中立之爲難，盼大國共同諒解，勿因戰國憑空吹求而疑中國[81]。照會一出，各國紛紛來照予以支持，並對照會內容大加讚賞[82]，適時鼓舞了艱難之局中低迷的氣勢。

這波高峰後，隨著戰局日漸明朗，雖然俄國仍不時針對上海弁兵管理、招匪、貨物運送等問題提出違反中立的抗議，但中國多能依循往例處

---

79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80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十六日。

81 日記中僅錄照會大意，全文見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卷186，頁101-102。

82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82，頁1570-1571。

理，俄國爲避免戰局延長，亦多能接受中國的處置[83]。反倒是日本方面持續挑戰中立的行動，在戰爭末期造成中國困擾。光緒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 3 月)日軍進入新民府，不僅任意採買物資，並預備在新民府設立軍政署，企圖干涉地方統治[84]。對於這些事件，外務部皆適時給予警告並詰問。此外遼陽州牧及海城縣令王順存間諜案的拏辦，是經外務部與北洋竭力交涉，日本始同意交由中國查辦[85]。明顯地，到了戰爭末期日本爲侵犯中國主權而違反中立的事件此起彼落，似乎早已在爲其戰後東北利權佈局。

一年多的戰爭，清廷雖無法避免東北遭戰亂蹂躪，但也因宣告局外中立，得以制止戰爭複雜化，維持局外地區的安寧，並保持主權完整。綜觀整個中立過程，中國以弱國之姿執行此政策，面對層層外交考驗，尚能表現毫不畏懼的一面。數次謹慎的考量與答辯，使戰爭末期國際間對中國中立表現不再有微詞。在鄒嘉來日記補充下，我們清楚看見外務部的努力，縱使事件處理仍有許多疏失，但誠如戴樂爾所言，假若我們能全面觀察中國何以急於做出正確行動，以避免中國陷於更深的泥沼，並在鮮少前車之鑑的情況下完成中立的任務。輕易忽視中國中立的貢獻，顯然不甚公平。

---

83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87.2，頁125。

84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日、二十五日。

85 鄒嘉來，《儀若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日、十五日、三十日；二月九日、十四日；三月十三日、二十日。

五、 小結

上述中國中立的情況，是筆者依循著《儀若日記》之順序，將事件加以分析、比較和綜合，搭配上官方史料與少數報刊，以及既有研究成果所呈現。從中我們重新認識中立過程中清廷的努力、外交官員的謹慎，以及弱國外交之無奈。交雜出現的挑戰及交涉，在在考驗著外務部的應變能力。清廷無論中央或地方，謹遵著中立規範，不願給予日、俄破壞穩定戰局的機會。當列強都在關注，甚至懷疑清廷維持中立之能力時，清廷以巧妙的外交照會搏得滿堂彩，適時避免戰局失控。

在過去，外務部努力不懈的一面往往為人所忽略，批評者經常視之為腐敗懦弱，但日記所呈現的實況正與此相反，每一個決策，絕非僅是被動地接招，更有積極主動地反應，唯有如此才能鞏固清廷的中立地位。若研究者能深入其中，瞭解外務部的考量不僅止於如何保持中立，就能體會筆者所言。諸如英國在西藏的行動、達賴北逃、南方法國船艦的交涉等都在此時發生，並與日俄戰局環環相扣。面對如此複雜的局勢，清廷努力依循著國際法原則，扮演好穩定中國地區國際秩序的角色，若一概否定其努力，實有失公允。中國中立衍生之問題，不只是日俄戰爭中的一部份，若以更廣大的視野來看，應該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

《儀若日記》有如大事日誌，簡要程度甚至比不上《東方雜誌》所整理之一月外交大事，但日記主人謹慎地紀錄，讓閱讀者能依循時間觀察事件轉變，在簡單的公務摘要中，發現外務部的決策過程，不時還能感受到危急氣氛。即便它可能存在著私人史料攥著的特殊目的，但就筆者觀察，

至少在公務方面已可視爲一份有價值的史料。相較於同時期之私人文獻，如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記》，著重於日常交際應酬，鮮少記載公事[86]；當時起居注官惲毓鼎的《澄齋日記》，文學性較高，對時事僅有部分評述[87]；時任職於郵傳部孫寶瑄的《忘山盧日記》，雖能對事件以旁觀者立場加以評論，可惜光緒三十、三十一年的日記已缺散[88]。若以探討中立事件而言，鄒嘉來《儀若日記》顯然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史料。但研究者若未細心探究日記的時代背景，搭配最根本的史料，可能就無法體會史料之價值所在。

日俄戰爭中國中立問題仍有討論的空間，仔細對照馬士與戴樂爾的論述，中國中立不僅與戰時國際法息息相關，清廷嚴守中立的動機、過程等等，都是可以繼續討論的議題。今日新史料出現，提供研究者一個擺脫過去研究侷限的機會。本文由史料分析出發，繼而實際從《儀若日記》來探討中立問題，亦確實更深入認識中國中立之角色。筆者相信，在學術風氣大開的今日，若研究者能善用豐富資源，將可更公允地評價日俄戰爭期間中國的表現。

---

86 那桐，《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8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一冊(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88 孫寶瑄，《望山盧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九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2.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六)》，台北：文海，1963。
3.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台北：文海，1963。
4. 那桐，《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5. 孫寶瑄，《望山盧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盛宣懷撰，《愚齋存稿》上、下冊，台北：文海，1975。
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一冊，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8. 鄒嘉來，《儀若日記》，未刊本，現藏日本「東洋文庫」。
9. 遼寧省檔案館編，《日俄戰爭檔案史料》，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
10. 關捷、董志正、田久川主編，《日俄戰爭史料集》，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11. 《申報》，上海：上海書局，1983。
12. 《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3。
13. 《俄事警聞》，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14. 《警鐘日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

C.E.P.S.

(二) 專書

1.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2. 坂野正高著，陳鵬仁、劉崇稜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台北：台灣商務，2005。
3. 馬士(H. B. Morse)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4. 吳振麟，《局外中立國法則》上編，東京：戰時國際法調查局，1904。
5.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1980。
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80。
7. 惠頓(Henry Wheaton)著，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譯，何勤華主編，《萬國公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8. 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9.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臺北：台灣商務，1993。
10. 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 鄭雪飛，《“自由船、自由貨”：戰時中立國海上貿易權利之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三) 論文

1. 川島真，〈日露戦争と中国の中立問題〉，收入：軍事史学会編，《日露戦争(一)国際的文脈》(東京：錦正社，2004)，頁79-96。

2. 王澈，〈日俄戰爭期間楊樞致端方函〉，《歷史檔案》，1(北京，1996)，頁67-75。
3. 任天豪，〈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4. 宋玉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俄戰爭在大連叢書》評介〉，《東北財經大學學報》，42.6(大連，2005)，頁95。
5. 李安山，〈中國民族主義的催生與困惑——從《東方雜誌》看日俄戰爭的影響〉，《國際政治研究》，1(北京，2006)，頁96-111。
6. 唐啓華，〈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3(台北，2005)，頁45-90。
7.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上海，2005)，頁66-75。
8.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87.2(濟南，2005)，頁118-126。
9. 蔡振豐，〈晚清外務部之研究〉，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5。
10. 彭法，〈日俄戰爭前夕國人心態剖析—以《俄警事聞》文章爲據〉，《貴州社會科學》，201.3(貴陽，2006)，頁157-159。
11. 關捷，〈日俄戰爭與中國——寫在甲辰日俄戰爭百年之際〉，《大連民族學院學報》，6.6(大連，2004)，頁38-43。

C.E.P.S.

Inspecting the Questions of China's Neutrality in Russo-Japanese War from "Yi-rou Diary"

Sih-Chi Peng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China's "neutrality" policy in Russo-Japanese War had been limited by the viewpoin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national emotion as well as the materials. Therefore, scholars mostly held the negative appraisal, and focused on the wrong policy-making of Qing government, but neglected the importance that how did China to carry out the neutral country role in the war. Zou Jia-lai, the owner of "Yi-rou Diary" which appeared recent years, had come the long-term assignment in the diplomatic institution of Qing government, who undertook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n handling the negotiation with Japanese and Russian during Russo-Japanese War period, Russia negotiates. Because of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s that he established the steady foundation for develops in the future. In his diary, records a lot of cases about how did Japan and Russia challenge the Chinese neutr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foreign office adhere the ground of legal principle to deal with all pressure come from right-and left tactfully. It might make up insufficiency of the past researches which had depended on official archives.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spects the neutral status of China in Russo-Japanese War by "*Yi-rou Diary*". Hope can understand further what the crossfire Qing government faced and the processes it worked during the neutral period, and to give the neutrality of

China more liberal appraisal.

Keyword: Yi-rou Diary, Zou Jia-lai, Russo-Japanese War, China's Neutrality Policy

C.E.P.S.